

〔日〕上垣外宪一 著

王宣琦 译

总主编 冯天瑜 〔日〕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日本文化交流小史

全书取文化交流与文化比较的视角，系统地考察了日本文化发展史。

在全面介绍日本与中国、朝鲜文化交流融汇的基础上，尤其强调了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如遣唐使、唐代诗歌对日本和歌的影响等。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日〕上垣外宪一 著

王宣琦 译

总主编 冯天瑜 〔日〕刘建辉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日本文化交流小史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日)上垣外宪一著;王宣琦译.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0

(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ISBN 978-7-307-05877-4

I. 日… II. ①上… ②王… III. 文化交流—文化史—日本 IV. G1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1406 号

NIHON BUNKA KORYU SHOSHI

by KAMIGAITO Kenichi

Copyright ©2000 KAMIGAITO Ken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CHUOKORON-SHINSHA, INC.,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CHUOKORON-SHINSHA, INC.,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EIJING COPYRIGHT OFFICE, China.

此书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株)中央公论新社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17—2006—027 号

责任编辑:詹蜜 责任校对:王建 版式设计:詹锦玲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950×1260 1/32 印张:6.25 字数:139千字

版次: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05877-4/G·1029 定价:15.00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买我社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总 序

冯天瑜

20 世纪初叶, 文化传播学派代表学者德国人格雷布内尔 (F · Graebner 1877 ~ 1934 年) 与奥地利人施密特 (W · Schmidt 1868 ~ 1954 年) 提出“文化圈理论”, 认为世界上存在若干文化圈, 每个文化圈包含一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共有成分。此说庶几反映世界文化史实际, 故近一个世纪以来逐渐被普遍采用。

“文化圈”作为文化传播造成的文化场, 指具有相近文化特质、文化结丛的文化群体所构成的人文地理区域, 往往由某一先进民族或国度组成“中心文化丛”(或曰“文化核心区”、“文化源地”), 以其首创的文化播扬于周边地区(或曰“文化边缘区”、“文化受容地”), 在核心与边缘的互动中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文化圈。当然, 这种中心——边缘关系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在历史进程中有所异动的。时下学界的普遍看法是: 希腊——罗马文化、从希伯来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华文化, 都曾是具有丰厚积淀与强大扩散力的文化源地, 以其为核心形成各自的文化圈。另外还有一种更具全球视野的划分: 东地中海文化圈(以后扩展为北大西洋文化圈, 俗称西方文化圈)、西亚北非闪族文化圈(今伊斯兰文化圈)、南亚文化圈、东亚文

化圈、中南美印地安文化圈。

文化圈可从地理、民族、语言、宗教、民俗等多种角度划分与命名。上述“东亚文化圈”以地理属性得名,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大略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越南、日本。从体质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居民同属蒙古人种;从文化人类学言之,这一文化圈共同拥有汉字汉文(故有“汉字文化圈”之称)、儒学(故有“儒学文化圈”之称)、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等。

拥有若干文化共相的“东亚文化圈”,是在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段,中国是东亚最先进、强大的国家,占据文化高势位,是文化输出国,中国的水稻、粟、麦栽培技术,冶金、养蚕、缫丝技术等传入越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之相随,前述汉字文化的诸多门类也播扬周边列国。诚如唐太宗李世民(599~649年)诗称:

指麾八荒定,怀柔万国夷。(《幸武功庆善宫》)

车轨同八表,书文混四方。(《正日临朝》)

越、朝、日等东亚文化圈周边诸国,皆有自己辉煌的文化创造,同时也都接受中国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以日本为例,曾一再派出“遣隋使”、“遣唐使”,彰显了东亚文化圈边缘带研习核心区文化的热情与执著。日本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年)强调,日本是中国文明圈的一员,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

日本文化是豆浆,中国文化就是使它凝成豆腐的卤水。(《日本文化史研究》)

时至近代，东亚诸国都面对工业化西方的来袭，西学东渐构成东亚文化圈的新命题，东亚诸国在 19 世纪中末叶先后进入社会及文化近代转型过程。比较而言，日本较迅速地吸纳西方近代文明，实现近代化，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成为东亚文化圈的先进国和新的文化源地，中日文化势位对比发生异动，文化传输的主流方向逆转：古代是中国——日本，近代是日本——中国，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中国出现留日热潮，便是中国人以日本为中介学习西方近代文明的一种努力。进入现当代，中、韩等国现代化取得长足进展，渐成迎头赶上之势，在新的文明水平上，东亚诸国发生着空前深刻的文化互动，东亚文化焕发出新的光耀，对全球文明的影响力也日益巨大，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当下世界最为强劲的两大文化圈，当然，其他文化圈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

概言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东亚文化圈诸国互为师友，由于文化互动而彼此受益。在近代，因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而与东亚文化圈其他诸国严重对抗，造成东亚文化圈的一大劫难。郭沫若先生曾把中日两国关系概括为“两千年玉帛，一百载干戈”。反顾东亚文化生成、发展的历程，我们有充分理由宣称：和则互利，斗则两伤。化干戈为玉帛是时人的使命，也正是本书系的基旨所在。

笔者近十余年来多次参加以东亚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并从事相关合作研究，结识东亚列国学者，并研习其论著，亲炙东亚文化丰富的内涵，渐以推介东亚文化为乐事。2004 年夏至 2005 年夏，笔者访学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出版社邀约笔者选取一批反映东亚文化的日文书籍，译介给中国读者。受命后笔者即与“日文研”刘建辉博士从近二十年出版的相关论著中择得八种，延请译

者，经两年劳作，成此“东亚文化研究书系”。

本书系着眼东亚文化圈生成与发展的曲折多致历程，所选择的论著，或总论整个东亚文化圈诸国间的文化互动（如池田温的《东亚文化交流史》、福井文雅的《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或用力于东亚文化圈某一国度的文化史（如铃木贞美的《日本的文化民族主义》、森贞彦的《〈菊与刀〉新探》、上垣外宪一的《日本文化交流小史》），或研讨东亚文化圈内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史（如古濑奈津子的《遣唐使眼里的中国》、阿部洋的《中国的近代教育与明治日本》、刘岸伟的《小泉八云与近代中国》）。就浩博的东亚文化而言，这些论著所述当然只是冰山一角，却也可以一斑窥豹、以蠡测海。

2007年10月24日拟于武昌珞珈山

前言

一 文化交流史的曙光

究竟何谓文化交流？这是一个关乎于文化定义的问题。在日本自从“文化”作为西方语言“Culture（英）”、“Kultur（德）”的翻译词语使用以来，它主要用于泛指人类精神上的活动、思想、艺术等意思。现在，甚至又将源自于基督教的精神比肉体、物质更优越的教义，还有文化作为人类活动，拥有与经济活动完全相反的、更为杰出的思想等诸多思维附加进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日本占有一席之地，文化的概念又逐渐被由人后天性地获取的知识、行动样式的总体之称这一新的定义所浸透。其结果是导致日语中文化这一词语的整体意思，现在带有一定的混乱程度被人们广泛地使用着。

作为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文化人类学的主张是正确的。不应该将作为人类行为的艺术或宗教与经济、政治等社会性的、物质性的活动相较划分出上等、下等的区别。这就如同人在职业上没有贵贱之分一样，不能把学者、僧侣、艺术家或贵族划分为上等人，而把工人、个体经营者划分为下等人。同样，作为人类活动的艺术、思想与经济活动相比，也不能随意为自己

日本文化交流小史

要求特殊的地位。

尽管如此，主要是在思想、艺术领域被称为文化的人类行为，也不可否定其与经济、政治等领域一样具有可以划出分隔线的独自性。进而从历史进展的大视野来思考文化活动时，假如站在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立场上来看，宗教和艺术这些关乎人类信仰乃至人的精神指向的活动，可以说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曾占据着十分显赫的地位。

这里让我们重新回到文化交流的问题上来加以思考吧。提起交流，一般都会认为是国际性的交流。也就是将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在文化方面的接触，称做文化交流。就如经济活动中财物被相互交换一样，文化也是被彼此传递，由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民族接受，从而找到一个新的活动场所。在过去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精神上的（即古老定义上的）文化活动主要是依托宗教承担的。基督教、佛教在已经过去的大部分世纪里，不是像今日我们想像的那样，给“信仰”特性化了的现象，相反倒不如将其视为美术、工艺或思想、文学、音乐等各方面的综合体更合适。总之，历史上的宗教行为应该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总体，也是文化范畴中的一部分。

我个人基本上对文化是指现代广义上的人类一般活动的定义持认同的态度，但我更愿意在这本书里使用仅限于人类精神活动方面的、带有些许“陈旧感”的文化定义来作为全书的基调。

相对而言，文化活动与经济的、物质的活动相比具有何种特征呢？其实，复制可能是最为便捷的方法。例如，语言行为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自如地运用。因此，假如当某一个国家或民族产生了一个崭新的、高雅的词语，它（虽然需要通过翻译工作者的介入）很可能在最短

时间里被全人类共同使用。

这种文化活动的特征或许在今日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比如，像汽车那种精密的机械，要对其复制也已经不是多么复杂、困难的事了。但它毕竟不像人去学说某句话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解决得了，它需要拥有一个大规模的工厂和众多员工的组织。再考虑到原材料和各种零部件的因素，要想百分之百地复制，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于是，贸易这一环节就成为须臾不可分离的条件。

如果仅从财物的意义上看，如果说当今时代出现了如同计算机的软件与硬件的这种界限模糊不清的状态，但我在后面提起论述的大部分历史时期中，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与经济活动的产物均是以极端不同的原理被传递、被消耗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考证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文化交流”与其他的交流方式之间存在区别的依据。

而且，从历史领域的思维方式说，文化交流的认识尚还处于一个新的阶段。迄今我们已经熟知的历史，均是写在文字上的东西，最初都是记载某一国家的政治史，或某些王朝兴亡的历史。然后在此基础上添加一些经济史或社会史，就构成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几乎与此同时，文化史的领域也产生了。但是这种历史学观念的发展主要是 19 世纪的产物，基本上在那个时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是被一国的国家主义框架所设定的。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勾勒出了全世界的历史蓝图，但它把重心放在了考察经济、社会结构变革的进程上。

文化交流史这一领域，从双重意义上来说都可以说它是全新的学科。一方面它不会像 19 世纪那样被限定在某一个国家的框架内，而是从各种立场、观点去观察思考处于变动中的大多数国家是如何参与文化活动的历史。另一方面，它又把文化

在人类社会活动中，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范畴自主地加以考察的历史。

我虽然强调了文化交流史的独特意义，但并非意味着我同时主张文化与其他领域，这种情况下大多指经济或贸易对于文化交流就不重要。正如本书在此后论述的那样，经济交流或贸易对于文化交流而言是基础，有时甚至会成为目的。因此，我将对作为文化交流基础的经济交流，随时纳入视野展开论述。

我虽然如此强调了文化交流的新颖性，但并不认为日本的学者至今对此视而不见。至少在日本以汉学为学问的人们时刻都会意识到过去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而且，即使像本居宣长那种对与中国的交流采取否定态度的人，但中国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几乎构成了他本人思想的核心已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

此外，日本大正时代（公元 1912 ~ 1926 年）是文化这一词语成为一个关键词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学术活动非常活跃的学者、思想家，如辻善之助、新村出等人的著作承载了文化交流史的概念，并使之被学术界广泛认可。

二 日本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性

的确，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日本在这种“文化交流史”的领域里，称得上是一个最有深刻内涵意义的实验室。在相对于其他民族，日本是处于地理上隔离状态下的岛国，从未经历过其他民族都曾体验过的民族迁移现象，仅是单纯地依靠从中国、朝鲜传入他国文化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衍生了独自的文化、文明。即便把从弥生时代至奈良时代所谓“泊来人”的潮流添加到考察的范围内，至少日本在人种、民族迁移的动态

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都算得上是最平缓的国家之一。过去，我们曾经为王朝延绵不绝的连续性，即所谓“万世一系”的说法而感到自豪，但在今天我们倒觉得当把民族迁移处于静态的状况作为理解日本的一种方式，就更应该重视把日本看做是一个在文化交流或文化吸收方面采取极其积极的、动态的国土、国家、民族，从而去论述它的文化交流史。

江户时期的政治状况被称为锁国或许是正确的，但如果连文化状况都被称做锁国的话，那应该说是极不负责任的。例如知识分子或有一官半职的人时常聚集在一起热心地学习外语即汉文的现象，无论如何这也算不上文化上的封锁。此外，自镰仓末期到室町时代出现了五山文学的昌盛，还有日本在中国元朝、明朝时代展开了频繁的贸易往来这些现象，从国际交流、文化交流的观点上看，完全可以将其评价为兴旺发达的时代。而且，我们此前对平安朝初期出现的汉文文学的鼎盛时期，与其后所谓的和式文化相比，我们所做出的评价难道不是太低了吗？

从尊重独创，模仿为耻的角度看，做出这些评述似乎也可厚非。但是在观察人类的活动以及文化现象时，无论是具有何等独创精神的人，其最初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行为都是从他人，如父母、朋友等周围的人那里耳濡目染地学来的，即通过模仿再开始行动的。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进程亦可以说形同此理吧。当我们欲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不去考虑他百分之九十九的模仿，而只关注他百分之一的独创性，那简直可以说是无稽之谈，倘若对日本文化也只对它独创性一面予以高度评价的话，无疑也是有些失之偏颇了。

日本文化的绝大部分，是建立在从周边各国异文化中学习来的事物之基础上的。学习与记忆是人类最基本的能力，当我

们将国家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来加以考虑的时候，文化交流在这个单位中，还存在着相当于被称为文化传统的内容。日本文化中包含着大量学习的历史。学习是人类值得自豪的本质，能从内在方面理解他人更是值得尊重的人格表露。日本人从中国及朝鲜半岛学到了诸多学问的事实，换言之也就是相对深刻地学习并理解了别国的文化。如果按先生高贵，弟子卑贱的说法，那么学习者自然处于下位。文化交流史在日本之所以被付之等闲的原因，或许正是这种来自儒教的差别感在根底上从中作祟。然而，以我在本书所处的立场上来说，我倒认为不如说对邻国拥有《源氏物语》这样卓越的文化产物全然不知的中国、韩国，才是犯下了无知或对异民族文化采取傲慢态度的错误。

日本文化交流的历史，特别是就中世纪封建时代而言，是一个完全没有传授，而只是重在学习的过程。我甚至想把它称之为光辉的学习历史。同时也是完全有理由为之骄傲、并值得“记忆”的历史。中国、韩国早在古代就已灭亡了的法相宗、华严宗、密教等古典种类的佛教教派，在日本依然作为宗教派系进行着兴旺活动的这一事实，可以说日本的确不愧是一个具有令人惊叹的、保存传统文化能力的国家。即使把由于日本四面环海而很少受到来自外国的侵略作为一条理由来予以考虑，依然应该对此做出高度的评价。

日本历史上民族迁移的潮流相对比较平稳，一般认为是采取了逐步添加的形式，在文化方面也是如此。从未允许新的文化如洪水般冲入进来，而将过去的一切彻底摧毁的形式出现过。通常，日本人会想方设法对历史的文物、传统文化等珍贵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加以保护，只要可能就给它注入新鲜血液使之重新成为新的主流。举例说明的话，我认为日本文化恰如我

们看到的地表沉积始终在平稳地进行，并向形成整齐有序的地层一般似地累积着。不偏不倚地观察这些层次的形成方式，正是本书的写作目的。

目 录

前 言	1
一 文化交流史的曙光	1
二 日本文化交流史的重要性	4
序章 文化交流的曙光	1
一 中国史书中出现的“倭人”	1
二 乐浪郡与加罗	2
三 汉倭奴国	3
四 作为文化交流的邪马台国	4
五 汉文表记在日本的起源	8
六 何谓日本文化	10
七 河内王朝的对外交往	11
八 马与铁	16
九 制铁术的引进与佛教	19
十 先进技术与佛教	20
十一 新的汉文与高句丽的僧侣	22
十二 《三经义疏》	25
十三 “汤之冈”碑文	27
十四 遣隋使	29
十五 大化革新的时代	34

第一章	律令制的导入	37
一	律令制与汉诗文	37
二	《怀风藻》、大友皇子、长屋王	40
三	新罗使节	42
四	山上忆良、大伴家持、《万叶集》	47
五	对新罗的思恋	55
六	从大安寺到东大寺	61
七	琵琶	69
八	弁正与阿倍仲麻吕	71
九	鉴真	76
十	吉备真备	83
第二章	平安京与密教的隆盛	92
一	桓武天皇与渡来人氏族	92
二	空海与真言密教	94
三	从嵯峨天皇的宫廷文化到“和汉兼才”	103
四	渤海使节与《源氏物语》	109
第三章	禅僧们的时代	114
一	《宋史》中记载的日本僧侣	114
二	荣西	122
三	道元	126
四	入宋的禅僧及来日的南宋僧侣	131
五	一山一宁及其弟子们	138
六	日元贸易与水墨画的领域	142
七	中国趣味的全盛时期与对其的反感	148
八	与李氏朝鲜的交往	152

第四章 从朱子学到《水浒传》	156
一 文禄·庆长之战	156
二 朱子学与基督教	159
三 朝鲜通信使	166
四 对唐话、明律的研究	169
五 幽灵鬼怪文学、《水浒传》	175
六 德川时代的比较文学	177
后 记	180